

中国共享式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基于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的分析

卢现祥¹, 徐俊武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湖北大学 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文章首先基于多维贫困指标 SHPI 构建了共享式增长指数 PEG, 然后运用公共支出、政府治理水平和部门效应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共享式增长。文章具体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长期和短期影响共享式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调整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估计了各部门公共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文章发现 1978—2008 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 但是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长期内, 在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水平三大类因素中公共支出方面的三个变量对 PEG 的影响最大。短期内, 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共享式增长; 公共支出; 贫困的增长弹性

中图分类号:F062.6; 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2)01-0027-11

一、引言

自共享式增长这一概念出现以来, 它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① 亚洲国家对共享式增长尤为重视, 亚洲开发银行 2007 年关于未来 10—15 年的长期战略报告把其基本战略由减少贫困扩展为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式增长。印度、泰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在最近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也体现了共享式增长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堪称实现共享式增长的典范。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 2010 年 9 月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的, 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明确将共享式增长作为未来的发展战略, 但实证研究共享式增长的文献并不多见。这一方面是由于共享式增长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另一方面也在于共享式增长很难在实证上被界定。不过,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学者认为在实现共享式增长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公共支出政策。亚洲开发银行(2009)的跨国分析显示亚洲国家的公共支出与

收稿日期: 2011-11-18

作者简介: 卢现祥(1960—), 男, 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徐俊武(1978—), 男, 湖北武汉人, 湖北大学商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共享式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公共支出的变动可以解释增长的贫困弹性 2/3 的变动,如果排除斯里兰卡,这一解释程度还会更高。这一结果与 Anand 和 Ravallion(1993)、Bidani 和 Ravallion(1997)、Self 和 Grabowski(2003)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也发现公共支出在解释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比较显著。如上所述,公共支出在促进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降低收入贫困和改善人类福利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但具体到中国,公共支出在实现共享式增长中的作用程度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考察。目前关于中国共享式增长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为少见,关于共享式增长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更是凤毛麟角。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拟先对共享式增长进行估算,然后对在实现共享式增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公共支出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如何实现共享式增长提出政策建议。

二、共享式增长实现程度的估算

(一) 贫困的增长弹性(PEG)的构造。基于 Kakwani 和 Pernia(2000)的方法,本文根据 PEG_G 和 PEG_I 构造一个指数 $\phi = 1 + PEG_I/PEG_G$ 用来测量共享式增长。^② 该指数的含义接近于相对意义上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PPG),反映了总体减贫效果与收入分配中性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之间的关系。对于非收入维度分配状况的度量,可以参照收入维度类推。例如,当识字率被看成是连续变量时,HDI 中的识字率指标就可以被看作是类似于贫困发生率的指标,这里的“贫困线”是指最低水平的读写能力。与贫困对经济增长的点弹性相比,弧弹性更适合观察有限时间内经济增长率变化对贫困率影响的轨迹。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PEG = \frac{\Delta H/H}{\Delta Y/Y} = \frac{H_t - H_{t-1}}{Y_t - Y_{t-1}} \times \frac{Y_{t-1}}{H_{t-1}} \quad (1)$$

其中,H 为贫困指数,本文采用多维贫困来度量,非收入维度的贫困度量方法参照联合国的人类贫困指数(HPI),具体方法下文介绍。Y 为实际人均收入,下标 t 和 t-1 为各指标所属时期。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会带来贫困指数的下降,因此弧弹性一般为负。参照 Kakwani 和 Pernia(2000)对 PEG 大小的分类,可以界定:当 PEG 小于 0 时经济增长具有共享性;当 PEG 绝对值介于 0-0.5 时经济增长具有低度共享性,当 PEG 绝对值介于 0.5-1.0 时经济增长具有中度共享性,当 PEG 绝对值大于 1 时为高度共享式增长。

(二) 近似人类贫困指数(SHPI)的构建。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从 1997 年开始每年发布发展中国家的人类贫困指数 HPI-1,分别用预期寿命 P_1 、知识 P_2 与生活水平 P_3 三个维度来度量健康损失、知识损失和生活水平损失,计算公式为:

$$HPI = [(P_1^3 + P_2^3 + P_3^3)/3]^{1/3} \quad (2)$$

由此得到的指数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HPI-1。目前,联合国发展

计划署的 HPI 是进行跨国分析时唯一能获取的多维贫困指标方面的数据。然而，迄今为止在应用多维贫困指标度量一国的 HPI 时还存在内在的困难，并且可用数据也很难获得，因此一些学者对 HPI 指数进行了一些修正以便应用可行数据分析一国的特定情形。如张衍和付彤杰(2009)提出了一个“拟人类贫困指数”用于度量各省级单位的人类贫困状况。^③ 本文依据他们的方法，构建“近似人类贫困指数(SHPI)”，并运用这个指数估计 1978—2008 年中国的人类贫困指数和各省级单位的人类贫困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SHPI = [(S_1^3 + S_2^3 + S_3^3) / 3]^{1/3} \quad (3)$$

其中， S_1 为 P_1 的替代指标，反映健康损失程度。 S_1 由 S_{11} 和 S_{12} 构成，计算公式为 $S_1 = (S_{11} + S_{12}) / 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S_{11} 和 S_{12} 分别表示为 $S_{11} = (85 - L^e) / 85$ 和 $S_{12} = \text{人口死亡率(以百分比表示)}$ 。其中，85(岁)是联合国设定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最高值， L^e 为实际预期寿命，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联合国《世界发展报告》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都有对应数据。对于 S_1 是否为 P_1 的有效替代指标，张衍和付彤杰(2009)采用“伐尔死亡概率法”根据《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了检验，发现 S_1 与 P_1 不存在显著差异， S_1 是 P_1 的有效替代指标。 S_2 为 P_2 的替代指标，反映知识损失程度，对应的统计量为文盲、半文盲人口占 15 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可以从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得到。 S_3 为 P_3 的替代指标，反映生活水平损失程度，计算公式为 $S_3 = (1 - \text{改水覆盖率})$ 。

(三) 多维贫困增长弹性的计算。为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我们先计算 1978—2008 年的 SHPI，结合对应年份的人均实际 GDP，然后依据(1)式计算 PEG。

表 1 给出了 1978—2008 年中国的 SHPI 估计值、人均实际 GDP 和 PEG 值以及 1998—2008 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公布的中国的 HPI—1 值。

由表 1 可见，1978—2008 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带来非收入维度的人类贫困指数的下降，但是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

表 1 1978—2008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

年份	HPI(%) ^④	SHPI (%)	人均实际 GDP(元)	PEG
1978		45.23	381.00	
1979		43.88	404.53	-0.55
1980		42.31	430.72	-0.55
1981		40.86	447.63	-0.87
1982		39.47	481.40	-0.45
1983		38.14	526.06	-0.36
1984		36.55	597.50	-0.31
1985		35.03	669.12	-0.35
1986		34.98	717.27	-0.02
1987		33.56	787.51	-0.41
1988		32.88	862.96	-0.21
1989		31.96	884.03	-1.15
1990		31.85	904.34	-0.15
1991		31.12	974.38	-0.30
1992		29.85	1 099.39	-0.32
1993		27.58	1 238.49	-0.60
1994		26.23	1 384.92	-0.41
1995		24.51	1 519.71	-0.67
1996		22.11	1 654.32	-1.11
1997		20.63	1 789.62	-0.82
1998	17.1	18.98	1 911.43	-1.18
1999	19.0	19.71	2 039.49	-0.57
2000	19.0	18.84	2 194.03	-0.23
2001	15.1	15.96	2 358.93	-0.06
2002	14.9	15.67	2 555.88	-0.04
2003	14.2	14.92	2 794.68	-0.12
2004	13.2	13.84	3 058.40	-0.17
2005	12.3	12.93	3 357.40	-0.19
2006	11.7	12.33	3 727.67	-0.08
2007	9.8	10.29	4 191.80	-0.11
2008	7.9	8.30	4 733.73	-0.05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9)、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人类发展报告》(1997—2008)。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按照 Habito(2009)研究亚洲国家共享式增长的方法，我们用公共支出、

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水平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共享式增长。其中,公共支出用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一般性支出衡量,部门效应用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增长速度衡量,政府治理主要用来测量影响共享式增长的制度环境因素。在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政效率更高、办事更透明和法治程度更高的政府更能促进共享式增长。世界银行(2006)的报告显示,在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由于缺乏法制环境和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财富差距和机会不平等造成了极度贫困的持续存在,并往往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这既浪费了人的潜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减缓持续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司法体系既可能在竞争环境的公平化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也可能强化现有的不平等。法律制度可以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阻止精英阶层对国家的俘获,从而确保消除市场上的歧视行为,促进经济机会的均等化。法律制度是社会游戏规则的基础和反映,也是程序公平的核心所在,是对投资至关重要的基础广泛的财产权和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所在。社会稳定与暴力程度对穷人的影响可能比对富人的影响更大,因为穷人能够用于自身防护的资源,如权力、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等,都较富人更少,所以也构成影响经济增长共享性的一个因素。国外学者在对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时经常采用 Kaufmann 和 Kraay(2008)定义的全 球政府治理指数作为度量政府治理的标准。这个指数包含 6 个方面的指标,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政府规模、法治环境和社会稳定三个指标作为对政府治理指数的替代。其中,政府规模用来测量政府的行政效率,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法治环境用来反映政府依法办事的程度,以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的“贪污贿赂案件数”和“渎职案件数”之和的增长速度表示。社会稳定用来度量政府的治理质量,用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的增长速度表示。综上所述,为了测量影响中国共享式增长的因素,针对上述三类因素,本文分别选择了如下变量,并列出了各个数据的来源,见表 2。

表 2 影响中国共享式增长的变量及数据来源

类别	变量	数据来源
部门效应	第一产业增长速度(AG)	《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产业增长速度(MG)	《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产业增长速度(SG)	《中国统计年鉴》
公共支出	一般性支出(GE)	《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性支出(CE)	《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社会性支出(SE)	《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治理	政府规模(GS)	《中国统计年鉴》
	法制环境(LE)	《中国统计年鉴》
	社会稳定(ST)	《中国统计年鉴》

注:一般性支出主要包括国防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经济性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工业支出和农业支出,社会性支出主要包括公共教育支出、科教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

为了消除不同变量量纲和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各指标值都进行了指数化处理。这样,我们可以利用 1979—2008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PEG_t = \beta_1 + \beta_2 AG_t + \beta_3 MG_t + \beta_4 SG_t + \beta_5 GE_t + \beta_6 CE_t + \beta_7 SE_t + \beta_8 GS_t + \beta_9 LE_t + \beta_{10} ST_t + \epsilon_t \quad (4)$$

为了考察影响共享式增长指数 PEG 的各种因素,我们运用协整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关系。通常我们可以用 ADF 检验来判断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进而判断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否存在。经确认协整关系存在后,我们构建一个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确定变量之间短期调整关系中的各个参数。下面我们按照协整方法研究影响中国共享式增长程度的各种因素。

四、实证检验

(一)ADF 检验。在判断(4)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必须对各个变量进行 ADF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阶数	滞后项	ADF 值	5%临界值	DW 值	结论
PEG	1	0	-4.1456	-3.9982	1.91	I(2)无自相关
AG	1	1	-3.0123	-2.9312	2.19	I(2)无自相关
MG	2	1	-4.7891	-3.2020	2.13	I(2)无自相关
SG	1	1	-3.0814	-2.8784	1.98	I(2)无自相关
GE	2	0	-3.6235	-3.1748	1.82	I(2)无自相关
CE	1	0	-4.0009	-3.9555	1.88	I(2)无自相关
SE	1	1	-3.8152	-3.4760	2.01	I(2)无自相关
GS	2	1	-3.9654	-2.7760	1.86	I(2)无自相关
LE	1	0	-2.8991	-2.7551	1.96	I(2)无自相关
ST	1	1	-3.7450	-3.7072	2.19	I(2)无自相关

注:I(n)表示该序列经过 n 次差分后平稳。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经过 1 阶或 2 阶差分后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各变量序列经过差分后可以达到平稳,但是属于趋势平稳,即具有线性趋势。

(二)协整检验。我们先进行 OLS 检验。为了尽量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我们采用逐步回归法。先对(4)式进行 OLS 检验,结果见表 4 中模型 1。在模型 1 中,我们从 t 统计值可以发现农业增长率(AG)、一般性支出(GE)和政府规模(GS)等 3 个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在长期内,第二产业增长率(MG)、第三产业(服务业)增长率(SG)、经济性公共支出(CE)、社会性公共支出(SE)、法制环境(LE)和社会稳定(ST)6 个变量与 PEG 之间存在显著的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观察另外 3 个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将(4)式中其他 6 个变量去掉,得到关于 AG、GE 和 GS 的计量方程:

$$PEG_t = \beta_1 + \beta_2 AG_t + \beta_3 GE_t + \beta_4 GS_t + \epsilon_t \quad (5a)$$

对(5a)式进行

表4 OLS估计结果

OLS检验,结果见表4中模型2。从模型2的计量结果可以发现AG显著,而政府规模GS和政府一般性支出GE依然不显著。为了验证本文关注的一般性公共支出GE与PEG之间的关系,我们剔除方程(5a)中的AG和GS两个变量,得到只剩下GE的计量方程: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截距	-4.6845* (-1.8551)	-8.7402 (1.5289)	-7.8891* (-2.313)	-9.8564* (3.8977)
AG	-0.0345 (0.551)	0.5578* (3.3312)		-0.2551* (2.4589)
MG	-0.1458* (4.2248)			
SG	-0.2256* (-3.2389)			-0.0581** (3.1224)
GE	-0.00381 (0.1221)	-0.2876 (0.9136)	-0.0162** (6.8714)	
CE	0.1288* (4.9875)			0.0989** (3.5684)
SE	-0.4412** (3.1169)			-0.4559** (5.9561)
GS	-0.1355 (-1.0610)	0.2254 (-1.3259)		
LE	-0.2121** (2.7717)			-0.1744*** (2.9124)
ST	-0.0651*** (-10.0607)			-0.0744** (-4.0607)
统计检验	R ² =0.8881 校正R ² =0.8213 DW=2.1978 F=188.65	R ² =0.6544 校正R ² =0.6298 DW=1.1516 F=176.52	R ² =0.4351 校正R ² =0.4277 DW=2.2791 F=156.78	R ² =0.8678 校正R ² =0.8413 DW=2.1184 F=163.21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PEG_t = \beta_1 + \beta_2 GE_t + \epsilon_t \quad (5b)$$

对(5b)式进行OLS估计,结果见表4中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一般性公共支出与共享式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经过对不同变量组合的试验,对PEG变动解释力最强的变量组合为AG、SG、CE、SE、LE和ST,用(5c)式表示,(5c)式的OLS估计结果见表4中模型4。相对于模型1而言,模型4所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并且R²和校正R²更大,F统计值也更大,因此解释力更强。(5c)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反映了长期内对PEG变动影响最显著的变量组合。

$$PEG_t = \beta_1 + \beta_2 AG_t + \beta_3 SG_t + \beta_4 CE_t + \beta_5 SE_t + \beta_6 LE_t + \beta_7 ST_t + \epsilon_t \quad (5c)$$

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1)长期内,农业增长率对PEG的影响不如服务业显著,但与预期相同,农业增长率与PEG反方向变动,但是它对PEG的影响很微弱。预期之外的是,以工业(制造业)增长率表示的第二产业增长率MG对PEG的影响并没有得到确认,有待进一步观察,这说明30年来工业增长总体上对增进经济成果的共享性没有明显作用。

(2)总体来看,在三大类因素中公共支出方面的三个变量对PEG的影响最大,除政府一般性支出GE外,另外两个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值较大。其中,社会性支出SE对PEG影响不仅显著,而且系数也是所有变量中最大的,这确认了30年间增加社会性支出对提高经济共享程度的重要性。长期内对PEG影响最不显著的是一般性公共支出,t统计值相对较小,但它与PEG的一元线性检验结果显示两者存在显著关系,尽管系数接近于0。这反映了在此期间政府的一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也可以认为一般性支出,如国防、外交、公共安全和公共行政支出等使每

一个公民几乎均等受益。令人意外的是，经济建设支出对 PEG 的影响虽然显著，但是系数为正，这表明中国的经济性公共支出并没有平等地惠及所有人，经济建设方面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有负面影响。我们将在下文就一般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三类公共支出中各个子项目与 PEG 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3) 法制环境和社会稳定对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有积极作用。政府治理中用来测量行政效率的政府规模对 PEG 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我们的直觉可能相反。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统计数据的口径问题，本文所用的政府规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市场化指数》，政府规模用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而行政人员一般仅指有政府单位编制的公务员，大量的事业单位人员和“编外”人员不被统计在内。因此，即使 GS 变量的系数不显著，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政府规模对共享程度没有影响，如果能获得有效的数据，还可以进一步检验。良好的法制环境能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共享性，这是因为一个更加法治的社会必然使机会更加均等，这样穷人在生产性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都能获得更多机会，从而提高人类发展程度。社会稳定之所以对 PEG 有积极影响，是因为受到可行能力的限制，穷人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在社会混乱中更难获得就业机会，从而更容易受到伤害。

(三) ECM 检验。(5c) 式中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 ECM 模型。为了确定表示各变量在短期内作用的参数，根据上述 ECM 模型和(6c)式，构建 ECM 模型如下：

$$\Delta_1 PEG_t = \gamma_1 + \gamma_2 \Delta_1 AG_t + \gamma_3 \Delta_1 SG_t + \gamma_4 \Delta_1 CE_t + \gamma_5 \Delta_1 SE_t + \gamma_6 \Delta_1 LE_t + \gamma_7 \Delta_1 ST_t + \Theta ECM_{t-1} + \epsilon_t \quad (6)$$

其中， Δ_1 表示一阶差分，误差修正项已经在协整检验部分求出，即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对(6)式进行 OLS 回归，结果见表 5。表 5 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对 PEG 的影响最显著且方向相同。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一般性支出的增长率每增加 1%，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会下降 0.30%；同时，政府规模的增长率每变动 1%，PEG 会同方向变动 0.38%。这些表明政府一般性支出与政府规模的增长对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是不利的。因此，要提高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

表 5 ECM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 值
γ	-0.1719	-0.9561
$\Delta_1 AG_t$	-0.2112 **	5.4589
$\Delta_2 MG_t$	0.1462	-0.2874
$\Delta_2 SG_t$	-0.1158	1.0957
$\Delta_2 GE_t$	0.3025 **	1.9845
$\Delta_1 CE_t$	0.0886	0.2119
$\Delta_1 SE_t$	-0.5714	0.1121
$\Delta_1 LE_t$	-0.3269	0.9976
$\Delta_2 GS_t$	0.3835 **	2.5687
$\Delta_1 ST_t$	0.1631	0.4512
ECM_{t-1}	-0.2303	-2.2891

$R^2 = 0.8981$, 校正 $R^2 = 0.8785$

DW = 1.7142, F = 157.84

应该对政府用于行政方面的经费进行压缩,同时加快行政改革,缩减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第一产业增长率对 PEG 有积极作用,第一产业增长速度每增加 1%,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会提高 0.21 个百分点。这表明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共享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人类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农业的发展能显著改善他们短期内的人类发展程度,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共享性。最后,从 ECM_{t-1} 的估计结果来看,第一产业增长速度、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的变动速度对长期均衡的偏离较显著,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偏离程度为 23.03%。

(四)对公共支出的进一步分析。短期内,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都与 PEG 同方向变动,对 PEG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长期内,经济建设支出倾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而社会性支出在提高非收入维度的共享式增长方面作用最为显著。这样在短期和长期的不同模型中,公共支出对 PEG 的影响有所差别。为了分析长期中各部门公共支出在共享式增长中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为了提高模型解释力,我们将部门效应 SGE 与政府治理水平 GGQ 作为控制变量,前者用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长率表示,后者用法制与社会稳定程度表示,并对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进行细分,经济性支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工业支出和农业支出,社会性支出主要包括公共教育支出、科教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

表 6 回归结果显示,在各部门公共支出中对 PEG 有显著影响的分别是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以及农业支出,这与 Habito(2009)对亚洲国家共享式增长的检验结果比较接近。说明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与亚洲国家类似的一些特征,如农业支出和教育、卫生等社会性支出对共享程度的影响等。另一方面,经济性支出中占主要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都对 PEG 没有显著影响。显然,就公共支出而言,可以通过两方面的改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共享性:一是优化结构,进一步扩大教育支出、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二是控制经济性支出的规模,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增加农业支出。

但是,实际问题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对政府决策者而言,经济增长和成果共享是一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的目标。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然要进行

表 6 各部门公共支出对 PEG 的影响

		估计值	标准差	t 值
检验变量	截距	0.175	0.071	2.643**
	教育支出	-0.351	0.214	2.729**
	卫生支出	-0.087	0.015	-3.009*
	科技支出	-0.120	0.107	-0.931
	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	-0.029	0.012	-4.114*
	农业支出	-0.135	0.017	-2.751*
	工业支出	-0.052	0.028	0.587
控制变量	基本建设支出	0.014	0.009	-1.021
	第一产业增长率	-0.126	0.148	-4.261*
	第二产业增长率	-0.021	0.005	-0.217
	第三产业增长率	-0.301	0.139	-3.106**
		R ² =0.912,校正 R ² =0.861		
		DW=2.032,F=57.057		

较多的经济性支出,尤其是基础设施支出;另一方面,较多的经济性支出和较少的社会性支出又导致了增长的成果不能被大多数人分享,带来了社会不公平问题。政府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取舍,然而这又是极其困难的。不过,从最近10年中国的公共支出结构来看,经济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而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在不断增加,两种支出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势(刘穷志,2009)。如果保持这种趋势,则未来贫困人口有望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更多,中国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将会提高。

五、结 论

为了估算中国的共享式增长程度,本文首先基于多维贫困指标 SHPI 构建了共享式增长指数 PEG,然后用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水平三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共享式增长,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长期内影响共享式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短期调整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部门公共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带来了非收入维度的人类贫困指数的下降,但是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尤其是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已经数次接近于0,并且1998年以后没有再出现过高度共享的经济增长。

2. 长期内,在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水平三大类因素中公共支出方面的三个变量对PEG的影响最大。社会性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程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没有明显影响,经济建设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另外,农业增长率对提高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有积极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微弱,不如服务业显著;以工业(制造业)增长率表示的第二产业增长率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没有确定性影响。最后,法制环境和社会稳定对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有积极作用,良好的法制环境能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共享性。

3. 短期内,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一般性支出的增长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会下降0.30%;政府规模的增长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会下降0.38%。

4. 在各部门公共支出中,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以及农业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有显著影响,经济性支出中的主要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都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但是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尤其是1998年以后没有再出现过高度共享的经济增

长。因此,在未来发展战略中,中国应该想方设法扭转这种颓势,提高经济增长的共享程度。就公共支出而言,可以通过两方面的改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共享性:一是优化结构,进一步扩大教育支出、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二是控制经济性支出的规模,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增加农业的支出。当然,对政府决策者而言,经济增长和成果共享是一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的目标。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然要进行较多的经济性支出,尤其是基础设施支出;另一方面,较多的经济性支出和较少的社会性支出又导致增长的成果不能被大多数人分享,带来了社会不公平问题。政府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取舍,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注释:

- ①共享式增长也被称为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对应的英文都是 inclusive growth,参见庄巨忠:《为什么中国需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0月12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0-10-12/4NMDAwMDIwMDU4Ng.html.
- ②Kakwani N, Pernia E. What is Pro-poor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0, 16 (1):1-22.
- ③张衔,付彤杰:《中国地区间的“人类贫困”:近似度量与分析》,《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 ④由于只能得到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预期寿命数据,需要对其余年份的预期寿命进行估计。假设这些年份之间预期寿命是平均增长的,2000年以后年份的预期寿命的估计方法为基期年份的预期寿命加年份差的1/10倍的2000年与1990年预期寿命差。例如,2004年的预期寿命=2000年的预期寿命+0.4×(2000年预期寿命-1990年预期寿命)。

主要参考文献:

- [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2]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2005[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 [3]樊胜根.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4]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 [5]徐俊武.中国公共教育支出效果: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0,(7):41-49.
- [6]Anand S, Ravallion M. Human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 On the role of private incomes and public servi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7(1):133-150.
- [7]Bidani B, Ravallion M. Decomposing social indicators using distributional data[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7, 77(1):125-139.
- [8]Self S, Grabowski R. How effective is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in improving overall

- healt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J]. *Applied Economics*, 2003, 35: 835—845.
- [9] Park A, Wang D. Migration and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0, 3(1): 49—67.
- [10] Ravallion M. Can high-inequality developing countries escape absolute poverty? [J]. *Economics Letters*, 1997, 56(1): 51—57.
- [11] Ravallion M, Chen S. Measuring pro-poor growth[J]. *Economic Letters*, 2003, 78(1): 93—99.

Empirical Study on Inclusive Growth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 Expenditure, Sector Effects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LU Xian-xiang¹, XU Jun-wu²

(1. *Economic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Hubei University, Hubei 430062,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inclusive growth index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and employs indices concerning public expenditure,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sector effects to study inclusive growth. Then it analyzes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determinants of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co-integration model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sector public expenditure on inclusive growth. It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08 is featured by inclusiveness as a whole, but the inclusive degree is low in most years. In the long run, the effect of public expenditure on PEG is the largest; in the short run, gen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nt scale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degree of inclusive growth.

Key words: inclusive growth; public expenditure; poverty elasticity of growth (PEG)

(责任编辑 许 柏)